

姚政 著

XIANQIN
WENHUA YANJIU

先秦 文化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本书承蒙下列单位部分资助出版：

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处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K220.3
Y376

姚 政 著

先秦 文化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文化研究 / 姚政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4.11

ISBN 7-80659-665-8

I. 先... II. 姚...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 先秦时代 IV. K2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442 号

先秦文化研究

姚 政 著

策划组稿	段志洪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028)87427333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
书 号	ISBN 7-80659-665-8 /K·106
定 价	1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姚政教授长期执教于西华师范大学，即原四川师范学院，是先秦史学科的专门名家，有多方面的著作，现将有关论文汇集修订，成为《先秦文化研究》一书，即由巴蜀书社印行。我作为相识二十余年的老友，在这里写几句话，谨向读者作一推荐。

我特别要说的是，姚政教授治学渊源有自。他曾从学于四川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大家知道，徐先生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弟子，1926年以《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论文毕业，自此终身精研先秦历史文化。1978年，徐先生以81岁高龄重任川大历史系主任。当年，教育部为抢救在“文革”活动中濒危的学科，委托他主办“先秦史进修班”，他重病未愈，仍不推辞（详见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暨执教七十周年纪念册》、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进修班于1979年3月开始授课，参加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后来都于先秦史领域作出很大贡献，姚政教授就在其列。

1980年，以上述“先秦史进修班”的学者们为基础，在开封举办了第一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由于讨论会成功，1981年又在西安召开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出席人员更多。我便是在后面这次会议上首次会见姚政教授的。他于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试论夏代国家的形成》，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收入这篇作品的讨论会的论文集，1982年以《人文杂志》增刊

形式出版。厚达 200 多页的这本《先秦史论文集》，印数不多，如今很难找到，而姚政教授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编进现在的《先秦文化研究》书中。

到了 1982 年的 5 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在成都，也就是在川大举行。会议推选徐中舒先生为理事长，原“先秦史进修班”各位皆成为学会的骨干力量。这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那时到今天，中国先秦史学会一直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前进，其间每一步又总是与姚政教授等学者的工作分不开的。

由《先秦文化研究》这部著作，很容易看到姚政教授在学科领域中眼界的开阔，驰骋的广泛。全书以文明起源及五帝之首黄帝的事迹传说开卷，重点置于夏商周三代，并且强调探索三者的源流脉络，各章于翔实的文献依据外，参取各种考古成果，多有创见。在关于方国历史文化方面，书内专设一章，以杞、曾、巴三国作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亦各有特色。

书里还有一章，专题研究了三代的农村公社。按农村公社，或译村社共同体，从来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上的重大课题，而且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熟悉学术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中国先秦时期存在怎样的这种共同体，文献里的井田是不是这种共同体，其兴衰机制和社会影响究竟如何，在上一世纪长时间为学者普遍讨论。近些年，这方面的论作似乎减少了，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很希望在姚政教授的书问世后，能引起新的、在当前学术水准上的讨论和探索。

在来信里，姚政教授告诉我，他业已退休了，但我深知他是退而不休。像他这样的学者哪里会休息呢？让我们期待他更多更大的研究成果的到来。

李学勤

2004 年 10 月 1 日于清华大学

目 录

序	李学勤 (1)
第一章 中国文明起源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1)
第二节 黄帝时代的历史与制作	(26)
第二章 夏文化	(47)
第一节 夏族的起源	(47)
第二节 夏代统一国家的形成	(62)
第三节 关于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79)
第三章 商文化	(86)
第一节 商族的起源	(86)
第二节 商代后期的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101)
第四章 周文化	(115)
第一节 周族的起源	(115)
第二节 西周的货币	(140)

第五章 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	(163)
第一节 三代的农村公社·····	(163)
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农村公社·····	(178)
第六章 方国文化·····	(198)
第一节 古曾国考·····	(198)
第二节 巴族国家的形成·····	(219)
第三节 杞国史考辨·····	(236)
姚政论著目录·····	(251)
后记·····	(256)

第一章 中国文明起源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就是奴隶制国家的出现。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何时，也就是中国国家形成于何时，这是一个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辩论以来，学术界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学术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于夏代，也有的主张开始于商代或西周，甚至认为铁工具才敲开了文明之门，战国时代，中国才跨进了文明的大门。以上诸说，除我国古代文明始于夏代一说已为多数学者所采用外，其余诸说已极少有人坚持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有的认为早在 6000 多年前的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就迈进了文明的门槛^②；也有的认为从黄帝到夏朝的建立为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即夏以前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2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②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中国最早文明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 年 7 月 14 日。

到夏禹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王朝^①。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后期，即相当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为了论证这个问题，现在就从中国铜器的起源和发展、阶级社会的确立、文字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形成等几个问题出发，进行探讨。

一、中国铜器的起源和发展

冶铜工艺的采用和铜器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由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过渡到奴隶制的青铜时代，标志着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和社会性质的飞跃。中国的铜器特别是青铜器起源于何时，这是当前考古界和史学界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由于原始社会晚期虽有原始文字，尚无用文字记载历史的文献，即使到了阶级社会，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中夏以前的史实也很少，因此，单从古文献出发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考察清楚。现在，我们就从考古学上来考察这个问题。

解放后，考古新成果证明，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初步掌握了金属冶炼工艺并能制造铜器。1956年，在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的156号墓中，发现一件铜片^②。有人认为这件铜片出自扰土，系晚期遗物，同仰韶文化无关。仰韶文化时期，发现的另一件铜器，是姜寨遗址里29号房子居住面上出土的圆形黄铜片^③。对于姜寨出土的黄铜片，有人在地层关系上无法否定，就说它是孤证，并认为中国从宋代起才能炼出黄铜^④。自姜寨时期到宋代以前的几千年间，并不缺乏黄铜的存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遗址出土的黄铜锥（详后）再一次证明，我国新石器

① 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1981年第5期。

②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③ 《陕西日报》1980年5月28日。

④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时代中晚期有黄铜存在。再让我们看看先秦文献。《吕氏春秋·别类篇》载：“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郭宝钧解释这段文字时说：“白”是锡，“黄”是铜^①。“白”是锡，是对的，它指出了锡的光泽呈白色。“黄”是铜，则不完全对。黄与白相对，都说的是铜和锡的色泽。呈黄色的铜，不是一般的铜，应是黄铜。我国古代的黄铜，既有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三里河龙山遗址出土的黄铜锥为证，又有先秦文献记载，它在我国古代就存在，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黄铜性脆，易损坏，后来铸器少，因而出土实物少，文献记载亦少，以致有人对我国古代有黄铜存在提出怀疑。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的同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用铜锌共生矿进行冶炼黄铜模拟实验。共冶炼十炉，结果都获得黄铜。他们的实验是很有意义的，“从冶金技术的角度，为早期出现黄铜提供了根据”^②。人类冶炼金属，最初能够冶出黄铜，这还可以古代东欧为例证。“在东欧，真正的青铜较西欧或西伯利亚为少，东欧锡太少。因此，流行另外一种代替青铜，有时也称为青铜的合金。这就是将红铜和铅或锌熔合在一起。”^③铜锌合金就是黄铜。黄铜在我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欧都曾炼出过，总不能再说它是偶然出现的孤证。黄铜器既出土于仰韶文化遗址，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我国的铜器起源于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最早出现的是黄铜器。

比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代稍晚的甘肃马家窑文化，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两件青铜器。一件是1977年甘肃东乡林家马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10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②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③ （前苏联）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楼宇栋等译本，第74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系单范铸成；另一件是1975年甘肃永登马厂遗址出土的残青铜刀^①。马家窑文化树轮校正年代的两个数据是公元前3100年和公元前3070年。马厂类型的年代稍晚^②。这些实物表明我国西北地区在公元前3100—前3070年间即已开始铸造青铜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距今五六千年，与仰韶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在大汶口晚期墓葬群的成年男女合葬墓里，曾发现一件带有孔雀绿色的骨笛，经化验，含铜量为0.099，证明为铜质所污染。一号墓坑保存完好，没有被扰迹象，这证明当时已有铜器。再观察该遗址出土的十六齿透雕象牙梳，通体满布四瓣花纹镂空孔的象牙雕筒和镶嵌松绿石的骨雕筒等^③，要制作这些刻镂精细的装饰品，没有坚硬的金属工具是难以想象的。据此可以推定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有了青铜器。

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阶段也有铜器，经历了一个由推测到证实的过程。过去根据《西清古鉴》记载，清朝宫中所藏青铜器的形制与龙山文化出土的陶鬶完全一致，推测龙山文化应有铜器存在^④。考古发掘材料证实龙山文化已有铜器出土。1974—1975年，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铸制的黄铜锥，据分析确属黄铜^⑤。三里河出土的两件黄铜锥与姜寨出土的黄铜片一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祖先并非到宋代才开始炼制黄铜，早在六千年至四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就能制造黄铜器了。另外，在

①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41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编《大汶口》第95—124页，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④ 《历史教学》1960年第8期。

⑤ 昌潍地区艺术馆、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山东牟平照格庄的龙山晚期遗址里还发现青铜锥^①。1955年，在河北唐山大城山的龙山遗址里，发现两件冷锻而成的红铜刀^②。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的龙山文化层里“发现了铜器碎片（铜质尚待鉴定）”^③。主要分布于河北东北部、内蒙东南部和辽西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上限据碳素测定、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2410 ± 140 年^④。该文化属龙山文化或其变种。这里普遍发现青铜器及铸铜陶范等^⑤，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确已进入青铜时代。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继马家窑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齐家文化。齐家文化早期的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2255 ± 140 年^⑥。它的晚期与夏王朝同时。齐家文化已普遍发现铜器。1975—1978年，在武威皇娘娘台齐家遗址中先后发现铜器30件，有铜凿、钻头、环、铜片、铜渣以及红铜刀、红铜镞等^⑦。1959年，在永靖大河庄齐家遗址里发现铜匕和残红铜片各一件^⑧。还在秦魏家齐家文化遗址里发现铜器6件，有红铜斧、青铜环、铜锥、铜泡等^⑨。齐家文化遗址里普遍发现铜器，并且青铜器与红铜器共存，锻铸皆有，证明已完全进入青铜器时代。1976年，在甘肃

①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0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的新发现》，《文史哲》1981年第1期。

④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⑥ 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⑦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玉门发现火烧沟遗址，其年代晚于马厂类型，相当于齐家文化后期阶段，大致与夏代同时。在火烧沟墓葬中出土大量青铜器。特别是在已发现的 20 多座用人殉或人祭的墓中，发现有铜匕首、铜矛、铜镞和铸镞石范等，因此，火烧沟类型的文化也完全进入奴隶制的青铜时代^①。

黄河中游，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里，已发现中原地区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容器残片^②。距今 4300 多年前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遗址里，H₁₅灰坑底部发现一块青铜炼渣^③。河南临汝煤山的龙山晚期遗址有冶铜坩埚出土^④，郑州牛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有青铜炼渣出土^⑤。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已有这样多的古先民能冶铸和使用青铜器，证明此时已进入青铜时代了。

纵观考古发掘出土的铜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初步的认识：我国的铜器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我国历史进入青铜时代，各地发展不平衡：中原地区在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东部沿海地区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甘青地区的冶铜技术比上述地区发展快，在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和齐家文化早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二、私有制产生和阶级社会形成

随着铜工具的出现，金石并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产品增

①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142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 年第 3 期。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 3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⑤ 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 年 3 期。

多并有了剩余，私有制产生了。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阶级对立逐步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①在古代人类的生活中，所谓动产就是他们日常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家畜等。占有这些动产的多寡不同，就出现了最初的财产差别和贫富分化，这种现象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墓葬中反映得越来越突出。

在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由于出现轮制陶器、陶祖和成年男女合葬墓，表明当时正转向父系氏族公社。仰韶文化墓葬里开始出现随葬品厚薄不均及个别墓的葬具质量特别高的现象。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大汶口文化，随葬制度中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相当突出。大汶口晚期 10 号大墓，随葬品的丰富精美，为这批大墓之冠。墓主人为一女性，有木椁，随葬精美陶器 80 多件。死者手握獠牙，头戴象牙梳，右臂佩一玉环，左股置一玉铲，右膝放一骨雕筒。随葬猪头猪骨 17 块，各类随葬品总数竟达 180 余件^②。随葬这样多的财物，死者当系显贵富有家庭的女主人。使用众多物品随葬，表明死者生前拥有这些私有财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埋葬时开始烧毁或销毁成为私有财产的一切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品等等”^③。在这些财产中，家畜在原始社会后期对私有财产的产生有着特殊意义。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特别加以强调，他指出：“家畜是比至今所知所有其他财产种类的总和更有价值的财产。……拥有它们给予人类心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3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②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编《大汶口》第 8—23 页，文物出版社，1974 年版。

③ 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第 2 页，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关于财富的最初概念。”^① 齐家文化的墓葬里，将近一半的墓用猪下颚骨随葬，少则两块，多则几十块。如临夏大河庄有一墓随葬 36 块，秦魏家一墓随葬竟达 68 块^②。永靖大河庄还有用羊头随葬的墓，少者 2 个，多者 8 个^③。前述大汶口墓葬有三分之一的墓随葬猪骨，43 座墓共出土 96 个猪头，一般 1 至 5 个不等，13 号墓竟有 14 个猪头^④。在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的一个墓葬中也多到 30 多个，少的也有七八个之多^⑤。家畜已成为私有财产，拥有这类私有财产多寡不等所反映出的贫富分化，在这些地区表现得十分清楚了。恩格斯说：“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⑥

私有制发展，出现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第一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的出现。奴隶制最早产生于父家长制的家庭之中。恩格斯指出：“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之内，一是父权。……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⑦ 奴隶产生于家长制家庭的事实，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我国中原地区最早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发现于仰韶文化晚期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 62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 85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④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编《大汶口》第 122 页，文物出版社，1974 年版。

⑤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直属队《1958—1961 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10 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⑦ 同上，第 52 页。

的华县元君庙遗址，这里发现一座一对成年男女与幼儿合葬墓^①。这种现象在仰韶文化遗址里是少见的。一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墓，在处于父系氏族阶段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里发现较多。属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因和刘林遗址，均发现有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②。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汶口墓地出土八座双人合葬墓。经过性别鉴定的四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各期都有^③。墓中男女地位显然不相等，男性是主体，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华阴横阵村龙山文化的男女合葬墓，数量虽然很少，但女子从属于男子的葬式却非常清楚^④。至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成年男女合葬墓，葬式和内容都较复杂。秦魏家第一、第二次发掘的合葬墓有 17 座。其葬式是男子仰卧墓中，女子侧身屈肢拱向男子^⑤。另一种是皇娘娘台的墓 24，三人合葬，一男二女都是成人，男性仰卧正中，二女侧身屈肢卧于左右，面向男子，似为屈从服侍之意^⑥。齐家坪还发现有 8 人和 13 人同坑的墓葬，看来一人是主，其余像是殉葬的奴隶^⑦。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的男女合葬墓与单人葬一样，没有完整的骨架，都是二次葬^⑧。乐都柳湾发现的六座马厂类型的男女合葬墓，除两座成年男女合葬墓外，另有三

①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 2 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 年 11 期。

②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 年 1 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编《大汶口》第 128 页，文物出版社，1974 年版。

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编《大汶口》第 125 页，文物出版社，1974 年版。

④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陕西华阴横阵村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 9 期。

⑤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河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 3 期；《临夏秦魏家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64 年 6 期。

⑥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 年 2 期；《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 2 期。

⑦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143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⑧ 同上，第 151 页。

座为奴隶殉葬墓。柳湾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奴隶殉葬更为普遍。如 M₃₁₄ 棺外有一侧身屈肢的青年女性奴隶，一根腿骨还压在棺下^①。这是阶级压迫的缩影，是当时已经存在阶级尖锐对立的明证。

上述众多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和奴隶殉葬墓从分布来说，东起东部沿海，西至甘青地区，包括整个黄河流域都有。从出现的时间来说，起至仰韶文化晚期，直到阶级社会，开始时仅是个别现象，到后来数量逐渐增多。对于合葬墓的社会含义，管见以为是主奴关系而不是夫妻关系，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夫妻关系。第一，合葬墓都是以一对成年男女同穴一次葬为其特征。在通常情况下，男女不可能同时死亡。谁为谁殉葬，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齐家文化墓中女子侧身屈肢面向男子的葬式看，是女性为男性殉葬，而不是相反。女性若为男性的正妻，男性死后，要把正妻甚至个别的墓还有子女当做奴隶为他陪葬则是不可能的。在父系氏族阶段，女性的地位虽已降低，但正妻的生命财产还受到女方氏族的保护，一般不可能为男子殉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步降低，这是总的趋势。但从中国历史的具体过程看，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由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商文化，这是一个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的连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历程中，大汶口文化以前是母系氏族阶段，女子的社会地位高于男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商代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男子，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商代贵族妇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还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商王在祭祀先公先王的同时，还举行先妣特祭。商王祭祀女祖先所铸的铜器，至今还保存着的我国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和“司母

^①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1期。